

镇江博物馆藏

佛教文物

镇江博物馆 编著



镇江博物馆藏 佛教文物

镇江博物馆 编著



文物出版社

《镇江博物馆藏佛教文物》编辑委员会

顾问：曹当凌 曹丽虹

编委会主任：周文娟

副主任：赵峰

编委：王永明 王书敏 王玲 刘丽文 刘敏 周文娟

杨正宏 张剑 张小军 赵峰 徐征

主编：杨正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镇江博物馆藏佛教文物 / 镇江博物馆编著.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010-4453-5

I. ①镇… II. ①镇… III. ①佛教—文物—介绍—镇江市 IV.
①K872.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79452号

镇江博物馆藏佛教文物

编著：镇江博物馆

责任编辑：于炳文

摄影：刘小放

责任印制：陈杰

装帧设计：杨婧飞

出版发行：文物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邮编：100007

网址：<http://www.wenwu.com>

邮箱：web@wenwu.com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9×1194 1/16

印张：13.75

版次：2015年11月第1版

印次：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10-4453-5

定价：248.00元

目 录



序 言	李裕群	1
概 述	王 玲	3
图 版		5
1 越窑青釉飞鸟百戏堆塑瓷罐		9
2 佛像飞鸟铜香熏		13
3 金佛像牌		14
4 铜佛造像		15
5 铜鎏金陈氏造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		16
6 鎏金铜牌		17
7 石佛造像		19
8 铜鎏金七佛造像		19
9 铜鎏金观音菩萨立像		20
10 铜鎏金观音菩萨立像		20
11 铜鎏金佛立像		21
12 铜鎏金地藏王菩萨坐像		21
13 铜鎏金佛坐像		22
14 铜鎏金观音菩萨立像		23
15 铜鎏金观音菩萨立像		24
16 铜鎏金梁绚造像		25
17 李玉铜造像		26
18 铜鎏金观音菩萨立像		28
19 铜鎏金菩萨造像		28
20 铜鎏金观音菩萨立像		29
21 铜鎏金双胁侍观音菩萨造像		30
22 铜鎏金四方佛塔		31
23 铜鎏金观音菩萨造像		33
24 铜鎏金观音菩萨立像		34
25 铜鎏金阿弥陀佛坐像		35
26 铜鎏金观音菩萨立像		36
27 铜鎏金菩萨立像		37
28 佛像立轴		39

29	写经册页.....	40
30	铜鎏金佛教造像.....	42
31	铜鎏金观音菩萨造像.....	43
32	铜鎏金佛造像.....	44
33	铜鎏金观音菩萨造像.....	44
34	铜鎏金观音菩萨造像.....	45
35	铜鎏金佛造像.....	45
36	银佛牌.....	46
37	铜鎏金昆仑奴造像.....	47
38	李德裕重瘞舍利题记石碑.....	48
39	重瘞长干寺舍利石函刻石.....	50
40	重瘞禅众寺舍利小石函盖.....	54
41	应夫题带盖小石函.....	56
42	人名刻石.....	58
43	人名刻石.....	62
44	长干寺舍利金棺.....	66
45	长干寺舍利银椁.....	68
46	禅众寺舍利银椁.....	69
47	润州甘露寺重瘞舍利塔记石碑.....	72
48	刻花长方形银函.....	74
49	和尚冲照大师砖墓志.....	78
50	和尚广慈砖墓志.....	79
51	长干寺舍利小金棺.....	80
52	释迦牟尼诞生银像.....	80
53	漆篋.....	81
54	带盖石函.....	82
55	刻铭石函.....	84
56	铜鎏金水月观音造像.....	86
57	红陶塔佛像.....	87
58	灰白釉弥勒佛像.....	87
59	曼陀罗尼经咒.....	88
60	铜佛造像.....	89
61	铜鎏金阿弥陀佛坐像.....	90
62	铜鎏金骑象普贤菩萨造像.....	91
63	铜鎏金菩萨坐像.....	93
64	铜菩萨坐像.....	94
65	铜佛坐像.....	95
66	铜佛造像.....	95
67	铜鎏金菩萨造像.....	96
68	梵文银盘.....	97





69	白釉褐彩供养人像.....	98
70	瓷佛法僧宝印.....	99
71	铜鎏金观音菩萨立像.....	100
72	铜鎏金菩萨造像.....	103
73	“佛法僧印”铜印.....	104
74	九华山吉祥阁铜印及印盒.....	105
75	鎏金塔.....	108
76	银塔.....	108
77	玛瑙片.....	108
78	玉块.....	108
79	珍珠.....	109
80	珊瑚枝.....	109
81	琥珀坠饰.....	109
82	铜盒.....	110
83	佛珠.....	111
84	太平通宝钱.....	111
85	瓷碟.....	112
86	珍珠.....	113
87	宝石.....	113
88	银元宝.....	113
89	金元宝.....	113
90	玉符.....	114
91	玛瑙.....	114
92	珊瑚龙.....	114
93	水晶印.....	114
94	琥珀茄.....	114
95	妙法莲华经.....	115
96	敕建南海名山普陀胜境图.....	117
97	手抄经卷.....	117
98	大明崇祯南海普陀山给冥途路引.....	119
99	铜千手观音造像.....	119
100	铜佛造像.....	120
101	铜佛造像.....	121
102	铜菩萨造像.....	123
103	铜鎏金释迦牟尼佛造像.....	125
104	铜高僧坐像.....	127
105	牙雕观音菩萨搁臂.....	129
106	御题金山图玉插牌.....	130
107	铜鎏金尊胜佛母坐像.....	136
108	铜鎏金六臂大黑天立像.....	143

109	铜鎏金忿怒手持金刚立像.....	145
110	铜鎏金药师佛坐像.....	147
111	铜鎏金释迦牟尼佛坐像.....	149
112	铜鎏金文殊菩萨坐像.....	151
113	铜鎏金绿度母坐像.....	152
114	铜鎏金绿度母坐像.....	155
115	铜鎏金释迦牟尼佛造像.....	156
116	铜鎏金无量寿佛坐像.....	157
117	铜鎏金无量寿佛坐像.....	158
118	铜鎏金高僧坐像.....	160
119	铜鎏金高僧坐像.....	162
120	铜鎏金护法神造像.....	163
121	铜鎏金吉祥天母造像.....	164
122	铜鎏金白布禄金刚造像.....	165
123	铜鎏金释迦牟尼佛坐像.....	166
124	铜鎏金白度母坐像.....	167
125	铜鎏金善财童子立像.....	168
126	铜鎏金送子观音菩萨坐像.....	170
127	铜鎏金菩萨造像.....	170
128	水晶弥勒佛坐像.....	171
129	牙雕三面佛.....	173
130	贝叶经.....	174
131	菩提树叶绘十八罗汉图册.....	179
132	绿料佛像.....	186
133-134	铜鎏金塔.....	187
135	牙雕佛像.....	189
136	铜天王造像.....	189
137	铜鎏金白度母造像.....	190
138	释迦牟尼佛擦擦.....	192
139	泥金宗喀巴擦擦.....	192
140	泥金拘留孙佛擦擦.....	193
141	高僧擦擦.....	194
142	大威德金刚擦擦.....	195
143	十八罗汉红木屏风.....	196
144	铜鎏金释迦牟尼佛造像.....	203
145	檀香木佛塔.....	204
146	于硕刻“西方三圣”牙牌.....	209
147	“西方接引”金钱.....	211





序

镇江博物馆编著的《镇江博物馆藏佛教文物》属图录性质的图书，该书汇集了该馆所藏从东吴至明清时期的金铜、陶瓷、石刻、经卷等各类佛教文物近 150 件。其中小部分属于镇江地区的出土文物，反映了这一地区佛教流行的状况；大部分则是该馆收集和接受社会捐赠的，由于来源不同，有些并非当地佛教遗物。

镇江，古称京口。位居长江南岸，毗邻六朝古都南京。从地域上来说，属于江南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心区域。就佛教文化而言，与中原和四川相比，这一地区佛教的传入与流行略显晚些，最早似可追溯到三国东吴初期。《高僧传·康僧会传》记载：三国“时孙权已制江左，而佛教未行。”吴地初有佛法，则是月支人支谦为避汉献帝末年战乱而入吴。孙权闻其才慧，召见悦之，拜为博士，使辅导东宫。从黄武元年（222 年）至建兴中（252 ~ 253 年），支谦在吴地译经。但这时“吴地初染大法，风化未全，”甚至连沙门的形象都没有见过。因此，世居天竺的康居人康僧会“欲使道振江左，兴立图寺，乃杖锡东游，以赤乌十年（247 年），初达建业（今江苏南京市），营立茅茨，设像行道。时吴国以初见沙门，覩形未及其道，疑为矫异。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称沙门，容服非恒，事应检察。’权曰：‘昔汉明帝梦神号称佛……。’”康僧会以舍利的神异说服孙权，“权大叹服，即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号建初寺，因名其地为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兴。”这一历史背景告诉我们，在康僧会入吴前，吴地还未见到佛陀的形象，当然也就不可能出现与之有关的文物。从南京博物院等编著的《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图录》（文物出版社，1993 年）一书中，所收集的附有佛陀形象的器物都是在公元 253 年以后的。这充分说明：吴地出现佛陀形象，与康僧会“营立茅茨，设像行道”有密切关系。

虽然在康僧会和统治集团上层的推动下，佛教逐渐开始流行，但影响极为有限，从东汉以来佛教依附于道家、方术和神仙的状况在吴地并没有多大改变，佛教的教义及各种仪规制度也没有普遍被人们所理解。在一般民众的心目中，外来的佛像与中国传统的“东王公”、“西王母”一类神仙是一样的，并没有多少差别。因而，这一时期出现将佛陀形象随意用作器物的装饰图案十分普遍，本图录展示的 1973 年金坛县唐王公社东吴墓中出土堆塑罐上的佛陀形象，以及 1974 年句容县收购的西晋时期的铜熏炉四尊佛像，便是佛教初传时期的一个典型特征。尤其是后者佛陀头顶有高大的肉髻，面容清晰，双手施禅定印的形象，已具有中国化的佛像特征。

到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扶持，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寺院的发展，僧俗信徒亦日益增多。佛陀的形象自然不能像以前那样作为装饰图案随意使用在器物上，而作为佛教徒顶礼膜拜的佛陀偶像得到供奉。本图录展示的 1962 年江苏镇江市东南郊汝山贾家湾东晋墓出土一件金牌，正面刻释迦太子像，有圆形项光，裸体，双手下垂过膝，双足叉立。此图像与佛传故事中的释迦诞生有关，在 5 世纪的北朝石窟



和单体造像中十分常见，表现释迦诞生后，龙王难陀兄弟为其沐浴，如云冈石窟第6窟中心柱，表现为释迦太子立于凳上，上方有九龙为其沐浴。虽然金牌中的释迦太子像没有龙的形象，但仍然可以确定为“九龙灌顶”的佛传故事。此为目前所见最早的释迦太子像，中亚犍陀罗同类雕刻中无九龙的形象，因此，其来源值得我们去探讨。

本图录最重要的是：较系统地展示了1960年镇江北固山甘露寺塔基地宫出土的唐宋时期舍利函、金棺银椁及其他遗物。根据舍利石函等铭刻可知，晚唐名臣润州刺史李德裕获“上元县长干寺阿育王塔舍利二十一粒，缘寺久荒废，以长庆甲辰岁（824年）十一月甲子移置建初寺，分十一粒于北固，依长干旧制造石塔”，“长庆乙巳岁（825年）正月戊申日建塔”。唐大和三年（829年）又“于上元县禅众寺旧塔基下获舍利石函，以其年二月十五日乙丑，重瘞藏于丹徒县甘露寺东塔下。金棺一，银椁一，锦绣襌九重，皆余之施也。”该地宫出土文物提供了许多重要信息。一，舍利来自于金陵长干寺和禅众寺。长干寺为六朝名刹，尤其是阿育王古塔舍利之因缘，在当时影响很大。对此，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记载颇详。并且提到隋炀帝在长安造日严寺时，缺舍利，“乃发长干寺塔下取之入京，埋于日严塔下。”李德裕重瘞长干寺舍利一事正好填补了该寺在唐代舍利的去向，即将长干寺舍利分置于建初寺和甘露寺。二，甘露寺东塔是依长干寺塔旧制而造，因此，长干寺塔有可能为石塔。按文献所记，长干寺为双塔配置的寺院布局，甘露寺既有东塔，自然还有西塔，从双塔配置的布局看，也应是模仿了长干寺。至明代，长干寺改为大报恩寺，寺院已为明代布局（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塔基与地宫发掘简报》，《文物》2015年第5期）。三，盛装舍利的金棺银椁，制作考究，图案精美。对于研究唐代舍利的瘞埋制度以及唐代金银器的制作工艺等提供了极好的实物资料。

社会捐赠的各类文物中，以鎏金铜造像最为显著，有北朝、隋、唐佛教铜像，也有元明清时期的喇嘛教铜像。其中唐代佛教铜像数量最多，种类丰富，有坐佛、观音菩萨立像、地藏半跏像、造像塔等，造型优美。其中昆仑奴鎏金铜像和四方佛造像塔较为少见。后者四方佛为三尊结跏坐佛和一尊倚坐弥勒佛，这在唐代石造佛塔塔心柱四面造像十分相似，如山东济南柳埠神通寺唐代龙虎塔的塔心室四方佛的组合以及济南长清方山神宝寺四方佛造像均有一尊倚坐弥勒佛（郑岩等：《山东佛教史迹—神通寺、龙虎塔与小龙虎塔》，台湾，法鼓文化，2007年）。从佛、菩萨造型看，这批北朝、隋、唐的佛教金铜像应来自于中原地区，是研究这一时期青铜佛像的重要资料。

总之，本图录的出版，将为研究者提供了基础的研究资料，值得重视。



概述

王玲

镇江是一座佛教文化兴盛的古城，历史上就有“三山五岭八大寺”之说。东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建普济寺于镇江焦山，至此，佛教在镇江传播开来，至今已有1800多年历史。镇江博物馆自1958年建馆，经过五十多年积累，收藏佛教文物数百件之多，时代起自东吴至明清。其来源既有镇江历年考古发掘资料，如甘露寺铁塔地宫、僧伽塔地宫、圔山塔地宫、东霞寺、“冲照大师”墓等出土文物，又有馆内旧藏、收购征集及社会捐赠的文物，其中唐嵩山先生捐赠的文物占很大一部分。

《镇江博物馆藏佛教文物精粹》收录馆藏佛教文物147件，包括造像、佛经、佛塔等不同质地的珍品，种类丰富，从一个侧面重现了镇江地区乃至全国佛教文化的发展轨迹。

公元前6世纪，佛教在印度创立，并于东汉初年传入中国。《三国志·吴志·刘繇传》记东汉初平四年（193年）丹阳人笮融在徐州、广陵间造像立祠，这是造像立寺见于记载之始^[1]。东汉献帝兴平元年（194年）普济寺始建于镇江焦山，标志着佛教在东汉献帝兴平元年时已传入镇江地区。

三国时期，由于吴地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尚鬼好祀”的习俗等因素，佛教得以迅速传播和发展，使“三国时佛教之重镇，北为洛阳，南为建业”^[2]。有关早期佛教在吴地传播的记载很少，只有康僧会在东吴地区“设像行道”^[3]等零星记载，但早期佛教造像的发现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填补早期佛教在该地区传播的空白。

1973年金坛县唐王公社东吴墓出土一件青瓷飞鸟百戏堆塑罐（图1），整体造型为在盘口鼓腹大罐上叠置一座三层庑殿式楼阁并附双阙，顶部罐口云集引颈展翅的群鸟及四小罐，楼阁周围塑有舞乐杂技俑、走兽等。罐腹部分三层纹饰，上层捏塑猴、飞鼠；中层模印佛像、天禄；下层捏塑蜥蜴、乌龟等。

1974年句容县四牌楼收购站收购一件佛饰铜熏炉（图2），铜熏炉下为侈口圆形承盘，中心伏卧一只狮形辟邪，狮背上立一圆柱，支托炉体。炉体腹部出宽沿，沿上一周铸四尊佛像和三支飞鸟，炉盖镂空四龙，并铸有四飞鸟。

这两件器物上的佛像均肉髻高耸，着通肩式袈裟，施禅定印，结跏趺坐。虽然佛像造型比较粗糙，但佛像特征基本表现出来，表明人们对佛教已有一定认识。而佛像作为图案装饰在器物腹部上，说明人们对佛像的尊敬还没上升到一定高度，没有将佛像尊为礼拜的圣像。佛像出现在飞鸟、天禄、乌龟等神兽类图像之中，“还未脱出作为中国本土的神仙思想和早期道教的附庸状态”^[4]。

佛教初传江南时期，道教就已经兴起，作为一种陌生的外来信仰，人们很难一下子接受，肯定会用对待本土固有相似信仰的办法去对待它，于是出现了特殊的“黄老浮屠”“浮图老子”阶段，表现出极大的中国早期佛教特点，东晋时已鲜见。

“晋南渡后，释氏始盛”^[5]，镇江地区先后建立泽心寺（金山寺）、鹤林寺、竹林寺等，佛教在该地区发展兴盛起来。东晋以降，真正意义上的礼拜像出现，佛教造像开始作为独立的崇拜对象而被供奉。1962年江苏镇江市东南郊汝山贾家湾东晋墓出土一件金佛像牌（图3），此佛像造型特异，与一般常见的容仪具足，宝相威严，着衣、披袈者不同，应是举行“浴佛”仪式时专用的释迦太子金像。金牌边缘有被剪痕迹，推断此牌原刻两尊佛像，背刻完整回纹，后被人从中剪开，墓主人夫妇二人各执一半。显系为了满足墓主的修行愿望，同时它与堆塑罐一样，反映了信徒们从佛教初传到独尊庙堂期间所经历的修行、礼拜的方式和特色。^[6]表明为佛教信徒顶礼供养的佛教造像开始出现。



南北朝时期，各朝统治者笃信佛教，佛教全面发展，出现了建寺造塔，开窟造像的风气，“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是描述南朝建寺立刹之风的经典之句，写经译经乘势而起，蔚成风气。梁武帝天监年间，十高僧受命于金山泽心寺集系佛教经典，编成《水陆仪轨》一书，后按此书办水陆大斋，创我国佛教较大规模的法会——水陆道场。佛教造像由于时间跨度大，王朝更替频繁，统治阶级重视程度不一，以及所受民族文化不同等，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并为隋唐佛教造像的成熟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国力富强，统治者为了政治的需要，对佛教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政策，天台、华严和禅宗等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相继形成，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基本完成，并逐渐演变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宗教，佛教的发展走向了鼎盛且佛教造像技艺亦已臻完美。

早期佛教的传播在经过“黄老浮屠”、“浮图老子”阶段，到李唐时期，佛教与儒道两家已充分融合，进入到了佛教文化中国化阶段，有甘露寺铁塔地宫出土的考古资料可以佐证。

1960年镇江文管会修复铁塔时，考古队在塔基下深约三公尺半的地方，发现一个地宫，地宫内放置一长方形大石函，函盖为宋元丰元年（1078年）四月八日“润州甘露寺重瘞舍利塔记”石刻一方。函内有唐宋石刻数方，详细记载了唐宋两代重瘞舍利的经过。第一次在唐长庆、大和年间（824～829年）李德裕任润州刺史时，将上元（南京）长干寺阿育王塔舍利中分11粒、禅众寺旧塔基下156粒舍利，移置新建的京口（今镇江）北固山甘露寺，以金棺银椁裹以锦绣九重瘞埋，并建石塔供奉，为唐穆宗祈造冥福。第二次是宋熙宁二年（1069年）在石塔旧址发现佛舍利后，改建铁塔一座，将佛舍利集中于一起，安奉供养。^[7]

镇江甘露寺佛祖舍利记载确凿、流传有序，从唐代李德裕题记、《法苑珠林》和《阿育王传》的记载看，它们重瘞于甘露寺前曾供奉于上元（南京）长干寺阿育王塔，即《法苑珠林》之“东晋金陵长干塔”，此前可追溯至阿育王于公元前3世纪分送至中国，再前可追溯至释迦牟尼涅槃后的八王分舍利，算来至今已近2500年了。这一重大发现，对江南地区佛教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值得人们骄傲和珍惜的佛缘^[8]。

甘露寺铁塔地宫内出土两套瘞埋舍利的棺椁类容器，共五件，其中唐代四件，即金棺银椁各两套，分别用于瘞埋长干寺和禅众寺舍利（遗憾的是一件禅众寺须弥座舍利金棺出土后不久即被盗）。据研究，用金棺银椁作为瘞埋舍利的容器始于武则天时期。据唐释道宣《集神州塔寺三宝感通录》记载，显庆五年（660年）春三月，敕取法门寺舍利往洛阳宫中供养，“皇后舍所寝衣帐直绢一千匹，为舍利造金棺银椁，数有九重，雕镂穷奇”，这应是以金棺银椁作为舍利容器的开始，而倡导者是武则天。^[9]之后，各地竞相效仿。考古资料证实唐代舍利容器集中分布于北方地区，南面不过镇江，南方地区几乎不见，“因此，在远离京畿、位于江南地区的镇江甘露寺发现金棺银椁，足证当时镇江与中原朝廷之间关系密切，同时也反映了其时以金棺银椁为主要容器的舍利瘞埋制度已相当成熟”。^[10]

李德裕以金棺银椁裹以锦绣九重瘞埋，并建石塔供奉释迦牟尼舍利，这种用金棺银椁瘞埋舍利的做法“改变了印度用罽罽瘞埋的方式，而用中国式的棺椁瘞埋，更符合于中国的习惯。”^[11]体现了中国式的瘞埋制度。

甘露寺铁塔地宫内出土的唐代舍利容器，馆藏共三件，即长干寺舍利金棺（图44）、长干寺舍利银椁（图45）及禅众寺舍利银椁（图46），其纹饰题材既有典型佛教文化特色，如伽陵频迦鸟、飞天等，又有中国传统题材如仙鹤、鸿雁等。两种题材图案出现在同一件器物上，真实地反映了李唐一代佛教经过“中国佛教化”、“佛教中国化”的同步演变，已然与儒道两家在内核层相互融合。^[12]

佛教造像经过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到唐代形成了具有明显时代风格的造像。面部丰满、服饰贴体、镂空壶门的台座等都成为唐代造像特有的表现手法。佛多身着袒右肩式袈裟或双领下垂式袈裟，亦可见早期的通肩式袈裟。菩萨造像较之佛像更加崇尚丰腴健康的肉体之美，发髻高耸、袒露上身、身披天衣、长裙



贴体成为唐代菩萨造像的共同特征，如铜鎏金观音菩萨立像（图 14），其轻如薄纱的斜披络腋，紧贴双腿的长裙，精工细作及婀娜多姿的体态，充分体现出女性的青春魅力，展示出盛唐时期佛教造像的风采。镇江博物馆馆藏唐代佛教造像约三十几尊，题材多是观音造像，亦有阿弥陀佛造像，而释迦像数量相对较少，表明西方净土信仰已呈上升趋势，说明当时观音崇拜极为流行，而这与佛教的中国化、世俗化紧密相关。

三

佛教在继唐五代之后于两宋时期继续繁盛，诸宗中最盛行的是禅宗。镇江金山泽心寺在当时被誉为禅宗丛林，先后有昙颖、怀贤、佛印了元、义天、圆悟克勤、善宁了心等著名禅师住持，皆属禅宗，寺内住僧三千余人。文人学士多来参禅，其最著名者如北宋苏东坡在佛印了元禅师住持寺院期间常入寺叩问。称赞此寺，曰：“金山寺观何耿耿，撞钟伐鼓闻淮南”。

宋代以降，佛教向深入发展。佛教中国化、世俗化和平民化的特征更为浓厚，佛教思想深入人心，社会各阶层人士崇奉佛教者比比皆是，上自皇室、公卿官僚，下至普通平民百姓，信仰佛教蔚然成风。^[13] 陈寅恪先生说：“自宋以后，佛教已入中国人之骨髓，不能脱离。”^[14]

1976 年镇江市新火车站小太古山工地征集一件宋代曼陀罗尼经咒（图 59），出土时折叠装在一小铜管内。印本中央圆栏部分右侧为主尊菩萨，双手合掌，跏趺坐于莲台上，左侧为胁侍，左手置于膝上，右手施与愿印，跏趺坐于莲台上，下方一人拜跪，惜头部已模糊难辨。栏外围有雕版印刷的梵文经咒 16 周，其第 2、4、7、11、14 周内刻有中文“范法素”字样共 10 处，可能即拜跪之人。经咒外周手绘彩色佛像八尊，中间隔以彩色莲花、契印等 24 个。该经咒应是一种可应购买者之需填写姓名的带有商品化性质的法器，随身携带可得到佛的庇护和保佑。证明到宋代，佛教已深入到平民阶层之间，更加社会化、普及化，并能进一步借助于当时先进的印刷术在民间广泛传播。

出于祈寿、祈福、祈财等世俗愿望，广大市民阶层礼佛需求的兴旺，极大推动了宋代佛教造像的世俗化发展，观音、地藏、罗汉等信仰对象成为造像的主要题材。较之唐代造像含蓄、高贵的风格，宋代造像更是追求一种栩栩如生的写实手法。

宋代时期常见的弥勒佛形象为五代浙江奉化僧人契此（俗称布袋和尚）形象。如 1999 年江苏镇江电力路金江花园工地出土的宋代灰白釉弥勒佛像（图 58），弥勒圆顶光头，肥头大耳，满脸堆笑，身披袈裟，袒露胸腹，双手捧肚，站立姿势。这位肥头大耳，大腹便便的弥勒佛形象与早期端庄秀美的弥勒上生菩萨像及庄严静穆的下生成佛像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佛祖形象的出现，标志着宋代佛教造像已深深融入到了世俗生活。

四

元明清时期，统治阶级崇尚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而内地民众仍崇奉汉传佛教，在内地佛教诸宗中，相对活跃的是禅宗和净土宗。

以下为镇江博物馆历年来与佛教有关的考古发现，文物虽不尽精美，但也为研究这一时期的镇江佛教文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1. 1961 年对僧伽塔地宫进行考古发掘，从塔下地宫中发掘“石函”一个，内藏珊瑚、玛瑙、珍珠和两座六面七级鎏金小塔等文物。南宋绍兴（1131 ~ 1162 年）年间，因避战乱由泗州高僧等慈奉僧伽像来镇江，于寿丘山建造僧伽塔。明万历（约 1595 年）迁塔于鼎石山上，成为镇江东大门的重要标志，此塔按明代风格复建，七级八面，密檐疏层，内为方形，错间而上，为砖砌仿木结构楼阁式，高 32.5 米，承于白石须弥座上。塔身四面辟卷形门，塔周建围墙，砌山门，立“古僧伽塔”石额。僧伽塔因瘞西域高僧僧伽（624 ~ 710 年）真身，故名。僧伽作为观音菩萨的化身而形成的信仰，在中国民间信仰中，从唐宋至宋元时代盛极



一时，各地建造塔寺、塑立真身供奉僧伽的情形比比皆是^[15]。

2. 1961年9月圖山塔维修时，对塔下地宫进行了发掘，出土一铜盒（图82），置于石函内。盒盖上方横向刻“坚固悠久”，竖向刻“大明崇祯柒年捌月，谷旦，直隶镇江府知府王秉鉴，通判刘泽宽、王修文，圖山镇塔宝藏，丹徒县知县张文光同安，吏部稽勋清吏司郎中郡人陈观阳拜手谨识，督理善士郡人陆大观，监工典史郡人陈大德”，内盛放佛珠、珍珠、珊瑚、元宝、太平通宝等文物。圖山塔原名报恩塔，明崇祯元年（1628年）陈观阳所建。陈观阳出生丹徒，自幼家境贫寒，在家乡父老的哺育下发奋攻读，后考中进士，官至吏部尚书，为报答家乡父老养育之恩，将毕生俸禄积攒起来，投入建造了“报恩塔”。这是中国佛教报恩行孝思想的体现，报恩行孝思想倡导“儒释以孝为宗”、“孝为成佛之本”、“佛行就是孝行”、“报恩成佛，成佛报恩”等报恩思想，这是中国佛教世俗化的反映，也是儒释高度融合的产物。佛教传入我国，即与道教、儒教不断斗争又互相融合，宋以后，佛归附于儒，佛教更加儒学化，“突出地表现为佛教的伦理化，并紧扣‘孝’字”^[16]，与儒教相比，佛教所追求的孝道更为广泛，“视一切众生如父母，让一切众生脱离苦海是一种宏大的‘孝’”^[17]。

3. 1961年江苏镇江大港东霞寺佛像内出土一批纸质文物，为明代妙法莲华经、明代南海名山普陀胜境、明代手抄经卷、大明崇祯南海普陀山冥途路引等，这些文物的发现，正是当时观音崇拜极为流行的反映。

上述考古发掘资料表明，明代时期，内地的民间信奉仍以汉传佛教为主。

元明清时期，汉传佛教造像式微，藏传佛教造像成为主流。明代，汉族地区民间仍信仰汉传佛教，所铸金铜造像不乏铸工精美之作，但到明晚期，汉传佛教造像的造型越来越差，头大身小，无雕塑之美可言。清代，皇帝信仰藏传佛教，藏传佛教造像成为主流佛教造像，汉传佛教造像的制作逐渐衰落。馆藏这一时期的造像以藏传佛教造像为大宗，其内容庞杂，可分为祖师、诸佛、菩萨、女尊、护法等五大类，其中以佛像、女尊像及护法像最具特色，如铜鎏金释迦牟尼佛坐像（图111），双肩宽厚浑圆，衣纹简洁，具有尼泊尔造像风格；铜鎏金无量寿佛坐像（图116）方座正壁下沿阴刻“大清乾隆庚寅年敬造”题款，为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祝寿佛像；铜鎏金白度母造像（图137）造型细腻、工艺精湛，具有清代宫廷造像的特点。由于汉地所铸藏传造像出自汉族工匠之手，而所铸铜像为汉族人使用，所以金铜造像的脸型、衣着样式都带有汉文化的审美趣味，只在发髻、耳环、璎珞、莲座等细小之处体现了藏式风格。^[18]如1982年4月江苏镇江小码头南星巷出土的铜鎏金释迦牟尼佛坐像（图144），此佛像的发髻、莲座具有浓厚的藏传佛教造像的艺术风格，但其脸部的汉化特征十分明显，面部丰满，下颏浑圆，并用阴线刻画双层下颏。馆藏这一时期的汉传佛教造像数量不多，题材更为世俗化，如送子观音、善财童子、布袋和尚等，更得民间大众的喜爱。

注释：

[1]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4章《汉代佛法之流布》之《竺融事佛》第50～5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2]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六章第87页，中华书局，1983年。

[3] 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

[4] 李正晓：《中国内地早期佛教造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3年

[5]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六“沙门艺术传始于晋书”条。

[6] 毛颖：《孝道与六朝丧葬文化》《东南文化》2000年第七期。

[7] 江苏省文物工作队镇江分队、镇江市博物馆：《江苏镇江甘露寺铁塔塔基发掘记》《考古》1961年第6期。

[8] 毛颖：《李德裕重痊佛舍利甘露寺有幸结佛缘——甘露寺塔佛祖舍利瞻礼》，《京江晚报》2007年8月25日B15版。

[9]、[10]、[12] 毛颖：《镇江甘露寺唐代舍利瘞埋制度及舍利子研究》《唐史论丛》第11辑。

[11] 徐莘芳：《唐宋塔基的发掘》《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613～616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13] 刘浦江：《宋代宗教的世俗化与平民化》《中国史研究》2003年。

[14]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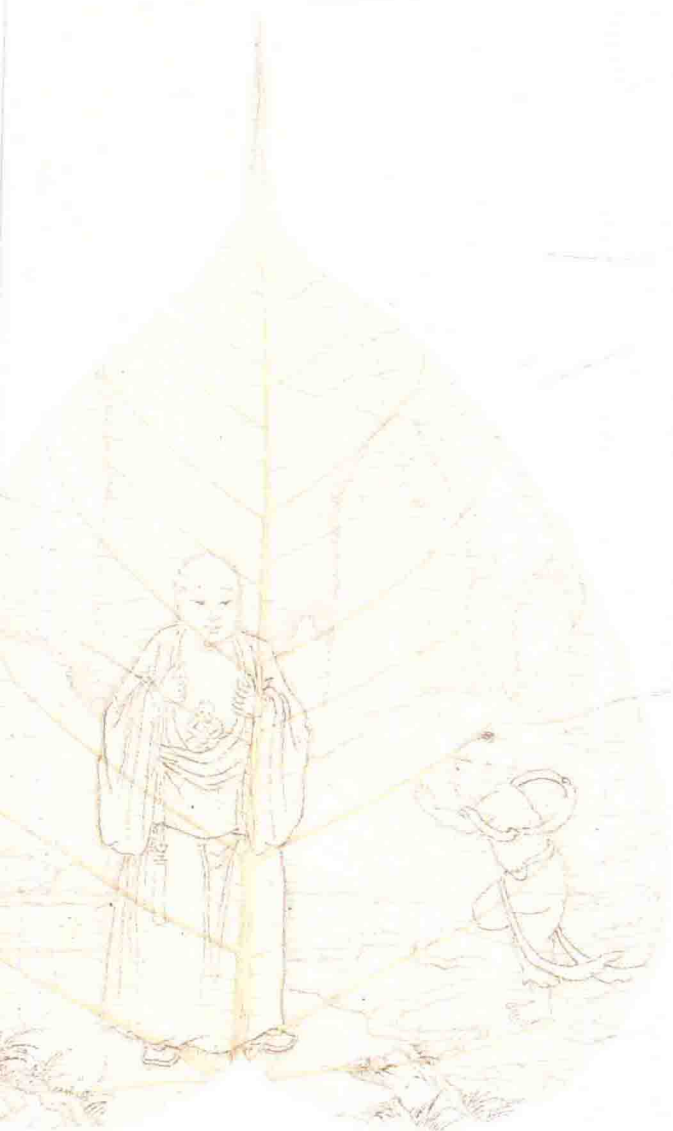
[15] 徐莘芳《僧伽造像的发现和僧伽崇拜》，《文物》1996年第5期。

[16]、[17] 李晓红、魏文斌：《麦积山藏“报恩科仪”儒释孝子事迹考及相关问题》《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3期。

[18] 金申：《汉传佛教单尊造像收藏鉴赏百科》第152页，中国书店，2011年。

图 版







1 越窑青釉飞鸟百戏堆塑瓷罐

三国

高 47.5、口径 9.9、腹径 28.5、底径 15.7 厘米

1973 年江苏金坛县唐王公社东吴墓出土

整体造型为在盘口鼓腹大罐上叠置一座三层庑殿式楼阁并附双阙，顶部罐口云集引颈展翅的群鸟及四小罐，楼阁周围塑有舞乐杂技俑、走兽等。罐腹装饰分三层：上层捏塑猴、飞鼠；中层模印仙佛模式造像、天禄；下层捍塑蜥蜴、乌龟等。胎浅灰色，全器施釉，釉色青中泛黄。在整器不到 50 厘米的罐上塑楼台、飞鸟、走兽、人物，集捏塑、模印、堆贴于一身。

